

看清志愿填报的喧嚣与门道

□ 湛涛

高考一结束，整个社会便陷入一场关于“选择”的集体焦虑。直播间里，“志愿填报专家”口若悬河；朋友圈中，“内部信息”满天飞；家长群里，一条所谓的“录取分数线”就能引发一场恐慌……喧嚣之中，许多考生和家长迷失了方向，仿佛只有花大价钱请“高人”指点才能安心。

拨开市场的迷雾，回归事物的本质，我们会发现：志愿填报既无“天机”，也非“玄学”，它本质上是一场基于公开信息、遵循基本规则、围绕个人价值取向进行的理性选择。看清其中的喧嚣与门道，考生和家长可以在这场选择中保持理性与清醒。

志愿填报不是越众看哪所学校好、哪个专业热，而是回到自身，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许多考生和家长一上来就陷入“既要又要还要”的困境——既想学校层次高，又想专业热门，还想学校所在城市好。可大多数情况下，因分数的刚性约束，没有谁能在各个维度都达成所愿。

志愿填报的本质是在分数限定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价值优先级作出取舍，关键是确立自己的价值排

序：学校层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地域优先还是就业优先？不同的优先级会导向完全不同的志愿方案。比如，分数不是特别拔尖，但又想上一所层次较高的大学，那就可能需要在专业和地域上作出让步，选择相对冷门的专业，或者去非一线城市的名校。反之，如果对某个专业有明确的兴趣和规划，那就可能需要在学校层次上适当降低预期。

没有最好的志愿，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志愿，一个基本原则是把最喜欢、最想去的专业和学校排在最前面。

如何根据位次合理定位、如何设置志愿梯度、如何规避退档风险，这些确实需要一定的经验和技巧。但这些技巧并非不传之秘，而是基于公开规则的逻辑推演，比如学校选择和排序可以按照“冲、稳、保”策略进行。

在志愿填报的信息海洋中，最可靠的信息源永远是官方渠道。各省教育考试院作为招生考试的主管部门，其发布的信息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准确性。他们每年都会发布两

类关键信息：一是去年各校录取的位次和分数，这是志愿填报最重要的参考依据。位次比绝对分数更有参考价值，因为每年试题难度不同，分数会波动，但位次相对稳定；二是今年各高校在本省份的招生计划和要求，包括招生人数、专业设置、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等，这些信息直接决定了能不能报、报了是否有机会。

此外，越来越多的省份还开发了免费的志愿填报指导系统。比如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推出的“蔷薇智愿”免费工具，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位次和兴趣筛选出符合条件的院校和专业，还能模拟志愿填报。这些官方系统的数据直接来源于考试院，准确性和权威性远非商业机构可比，而且全部免费。

市场上那些收费高昂的“志愿填报专家”并没有“内部信息”，掌握的信息都是各省份考试院、各高校公开发布的。他们无非利用信息差，把这些公开、免费的信息整理一下，再用一套听起来专业的术语包装起来而已。

人工智能时代，考生和家长还可以借助权威AI工具辅助志愿决策。

比如DeepSeek、千问、豆包等主流AI工具，都能为志愿填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考生告诉AI自己的分数、位次、选科、兴趣爱好、职业规划，让AI帮忙初步筛选一批符合条件的学校和专业，作为志愿填报的起点。

这里要特别强调两个字：参考。AI给出的建议只能作为参考，不能照搬。因为AI不知道当事人真正的兴趣是什么、家庭具体情况和对未来的深层期待。志愿填报最终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选择，需要结合当事人的价值观、兴趣、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这些都是AI不能完全替代的。

正确的使用方式是把AI当作一个高效的信息助手，用AI做初步的筛选和整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到相关学校官网深入了解专业设置、师资力量、就业情况，再结合自己的情况作出最终选择。

仔细核对是志愿填报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经过前面的步骤，基本形成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志愿单表。但在正式提交前，考生一定要花时间进行核对。每年都有考生因为志愿填报失误而留下遗憾：有的没注意身

体或成绩要求，不符合条件却填报了相关专业，结果被退档；还有的把学校代码、专业代码填错了，与心仪的学校失之交臂。这些失误只要多花一点时间核对，都可以避免。

此外，要到目标高校招生官网核对最新的招生章程。招生章程是学校招生的官方文件，具有法律效力，会详细说明录取规则、专业分配原则、特殊要求等。比如，有的学校有专业级差，有的没有；有的学校承认加分，有的只看裸分；有的专业对单科成绩有要求。这些细节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录取结果。

志愿填报不是一场赌博，而是一次基于善用工具、不依赖工具，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孩子收获的不仅是一份满意的志愿表，更是一种受用终身的决策能力。未来的路很长，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不是上了哪所大学，而是是否始终保持学习的热情、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生活的热爱。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在志愿填报的喧嚣中保持清醒，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教师职责过载不能止于叫停

□ 李纪超

最近，两则涉教师负担的消息引发关注：河北邢台某区因周末发生学生打架事件，教育部门安排中学教师周末到县城大街进行安全巡逻，各校每天派两名教师在划分区域巡逻，甚至要到网吧、台球厅附近查看是否有学生不当行为；四川达州、成都等地学校落实大宗食材进货“双人或多人联检”查验制度，要求教师清晨到校验菜，强制轮班，不遵循自愿原则。事件曝光后，两地均迅速叫停、整改。

让教师当巡视员、验菜员，是典型的非教育教学任务，触碰了给教师减负的红线。叫停是当然之举，但如果到此为止，恐怕还未触及关键。

给教师“增负”事件屡见报端，与基层管理方式粗糙有关，也与学校和教师的职责过载困境有关，本质是与学生有关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责任未能科学分配，最终由作为末梢的学校兜底，这是当前教育领域一个需要被正视的现实问题。

当前，学校和教师职责过载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校功能泛化，职责已从相对单一的教书逐步扩展至学生管护、生活服务、安全保障、心理干预等方面功能，但学校架构和人员配备却未能完全同步，任务多了、人没增加，只能内部消化，最终转嫁到一线教师身上；二是责任归属错位，当前社会竞争压力、家庭教育缺位等问题凸显，只要事关孩子，都归结为学校、教师的责任，这种“出事就找学校”的思维惯性把孩子成长中的大量社会责任单向度压在了教育系统；三是解决问题的路径依赖，期待学校扮演全能角色，把所有与孩子有关的问题都抛给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体现了一种治理上的惰性——与其费力协调多部门，不如向教育“一派了之”。

从这两起事件看，让教师上街巡逻起因是周末发生学生打架事件，教育学生学校责无旁贷，但重点应是校内，如果把社会层面的管理也划归学校，显然超出了学校的职责范围；餐饮服务目前已经成学校的标配，保障食材质量是应尽之责。落实查验制度的确必要，但学校本就面临编制紧张、人手不足的问题，验菜制度无疑又增加了人员成本。正如当地回应称“食堂管理人员有限，不得已动员教师参与”。一句“不得已”道出了现实困境。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层面都密集出台了系列教师减负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依然禁而不绝，原因在于纠治往往只回应了“不要干什么”，而未解决“该干的土壤谁来干”的问题。只要产生问题的土壤存在，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情况就在所难免。所以，给教师减负除了要严格落实减负措施，不触碰红线，治理思维需要更深一层、更进一步，从根本上破解学校和教师职责过载问题。

一要厘清权责边界，解决职责超限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学校承担的是教育、管理职责，而非监护责任。我们要梳理学校职责清单，分清哪些是教育教学核心职能，哪些是保障服务职能。对于确需学校承担的衍生职责，如心理健康教育、食品安全管理等，应在编制核定、岗位设置、经费拨付中予以保障，而非只给任务不给资源。如果确实无法增加人员，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解决，不能转嫁给教师。

二要明晰角色定位，解决责任倒挂问题。良好的教育生态是各归其位、各尽其责——家庭当好第一课堂，社会当好成长的大课堂，学校回归育人的主阵地。需要学校参与的事项应明确责任，不能把学校和教师当作唯一责任人。在甄别的基础上再进行责任认定，责任主体是学生监护人，就不能以学生身份为由全部交给学校。

三是破除路径依赖，解决方法单一问题。解决教育管理和服

防溺水，上线更要上心

□ 吴启花

盛夏将至，江河水边清凉却暗藏杀机。近日，最新版《温州市鹿城区“防溺水”重点警示水域地图》正式上线。“防溺水地图”让市民能够有图可查，知道哪里危险、该避开哪里。但若停留在“上线”和“转发”，便容易沦为另一种形式主义——家长收到即划走，学生看过即忘记。

这张地图到底管不管用，取决于有没有被看见、被记住、被用上。让地图真正发挥作用，至少要走好四步。第一步，从“被动查”变“主动送”。不少类似的地图都是公开一个链接，对于那些不怎么看手机通知的家长，特别是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一个链接约等于不存在。有些地方的做法值得借鉴：把纸质地图贴到社区公告栏、村口小卖部、学校大门口，家长接送孩子时抬眼就能看见；对留守儿童家庭，村干部直接上门送图，当面把危险水域讲清楚。

第二步，从“标出来”变“管起来”。地图上画了红线，告诉孩子“这里不能去”，可是，如果河边连个像样的防护都没有、警示牌烂了也没人修，知道了又能怎样？教育部明确要求防溺水工作要“紧盯重点水域，推动相关部门完善警示标识，配置防护设施，加强日常巡查，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对标注出来的重点水域的警示标识及时加固和维修。让危险真正远离孩子，不能只靠一张图来提醒。

第三步，从“告知风险”走向“认知内化”。地图上的红点不应只是家长手机里的图片，更应成为学校安全教育课的“活教材”。目前各地学校普遍推行“1530”安全教育制度，即每日放学后1分钟、每周放学后5分钟、节假日放假前30分钟对学生

进行安全提醒。教师可以结合本地防溺水地图，带领学生分析“为什么这些水域危险”，比如暗流如何形成、水深变化怎样判断、水温差为何容易导致抽筋，让学生从被动接受警告转为主动探究风险。安全意识的培养不能止于“不准去”的命令，而要让孩子理解“为什么不能去”。当孩子理解了危险背后的科学原理，敬畏感才会从心里长出来，而不仅仅是因为“大人不让去”。

第四步，从“一张图”织成“一张网”。学校该做的教育要做到位——防溺水不是念一遍通知就结束了，要让孩子打心底敬畏水域、懂得避险。有条件的社区和学校还可以建设适宜的游泳、戏水场所及相应设施，满足学生学习、休闲和娱乐的需要；家长该盯的孩子要盯紧——再忙，也得知道孩子去哪儿了、跟谁去的，什么时候回来；该管的水域要有人管，河边该有人巡的时候有人巡，该有的警示牌一块都不能少。只有学校尽责、家长负责、社会担责，这张网才能兜得住孩子的安全。

一张“防溺水地图”值得点赞，但它只是起点。真正有效的防溺水教育是从告知危险走向阻断危险，从一张静态的地图变成一张覆盖学校、家庭、社会的防护网。当安全意识真正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而不仅仅是一张被转发的图片，防溺水教育才算真正做到了。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官河小学）



研学，有“行”更要有“学”

□ 程守胜

广州滘岗大山里，研学团的孩子无序采矿，山林植被惨遭破坏；云南虎跳峡未开发区域，8岁男童失足坠崖，付出生命代价……接连曝光的研学乱象在暑假到来的这个时间点引发各方关注。研学旅行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组织安排的校外教育活动，须坚持教育性、实践性、安全性、公益性、普及性五项原则，是一门必修课。现实中，当研学变成“只游不学”，当学校因怕投诉而退出组织，当冒险项目被包装成教育卖点，每一次偏离，都是对研学旅行本质的消解。

与其崇拜远方，不如从脚下开始

□ 程守胜

近期接连曝光的研学乱象，将无证经营、安全失防、生态破坏等问题再次推到公众面前。舆论呼吁加强监管、提高准入门槛，这无疑是在整治乱象的必要手段。但乱象屡禁不止的背后，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认知根源：大众对研学普遍存在“远方崇拜”。

这种认知误区的扩散与研学市场的急速扩张互为表里。艾媒咨询发布的《2025年中国研学游市场发展状况及消费行为调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研学市场规模已突破2132亿元。市场急速膨胀，逐利机构蜂拥而入，“越远越有价值、越奇越显高端”的误区也随之蔓延。应当承认，跨省探访历史古迹、奔赴野外开展地质科考、走进不同地域感受文化差异，这些远途研学确

实能拓宽学生视野、打破生活圈的局限。但当下的研学市场，名头一个比一个猎奇，路线一个比一个偏远，仿佛不如此就算不上真正的研学。

可是，研学追求的是“学”而非“游”。《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要求，学校应当根据学段特点和地域特色，逐步建立小学阶段以乡土乡情为主、初中阶段以县情市情为主、高中阶段以省情国情为主的研学旅行活动课程体系。换言之，就近研学并非退而求其次的妥协，而是政策设计的本来面貌。新课标强调实践育人，本质是让学生走出课堂，在真实情境中观察、体验、思考，收获书本之外的成长，这与路程远近、项目刺激程度并无必然关联。一味

追逐远方和新奇，反倒容易陷入“只游不学”的形式主义，也容易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

比起盲目崇拜远方，研学不妨先从脚下开始。有人会说，家门口的东西天天见，有什么可研究的？今年河南中考语文试卷里的一个细节最能说明问题：不少农村学生不知道“麦芒”是什么，不会写“麦秆”的“秆”。尽管他们一出门就是连片的麦田，但没人教他们认一认麦芒的形状、讲一讲麦秆的用途，帮他们把身边的风物与书本知识串联起来。

学生身在家乡不知乡，对身边的事物知之甚少、熟视无睹，而研学恰好可以利用学校和学生身边的资源补上这一课。更不用说那些本乡本土的历史遗迹、文化

名片、红色资源、非遗项目乃至新农村建设典型。这些资源伸手可及、成本不高，又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紧密相连，本该是研学最得天独厚的优势，却长期被当作“不够高端”的内容闲置浪费。

可喜的是，不少学校已在这方面作出有益探索：系统梳理本地的历史旧址、红色纪念地、民俗非遗与农耕资源，编写校本教材与研学手册，与周边单位联动打造研学基地，进而构建学校周边的“研学圈”，让学生读懂家乡历史文化、涵养乡土情怀。

整治研学乱象，既要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压实安全与教育责任，从供给端清退靠猎奇噱头引流的不规范研学，也要补齐本土化优质研学课程的供给短板，支持学校开发乡土研学体系、培训专业师资、联动地方文旅与非遗资源，让身边的教育资源真正用起来，也让研学回归育人的初衷。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滑县留固镇第一初级中学）

学校退出研学，问题就解决了吗

□ 何小波 吉丹

研学市场野蛮生长的同时，一个更隐蔽的现象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学校，干脆不组织研学旅行了。一位校长坦言：“不是不想组织，是不敢。收费，家长怀疑你吃回扣；选地点，有人说太远，有人说太近；定内容，有人说太苦，有人说太松。怎么做都被投诉，不如不做。”

这并非个例。但凡学校组织的带有收费性质的集体活动，都难免遭遇同样的困境。无论价格如何、内容如何，总有一部分家长质疑学校或教师从中牟利。学校被投诉怕了，教师被折腾怕了，最终的选择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闭环：学校退出研学，家长只好自己找机构；机构野蛮生长、乱象丛生；舆论呼吁规范机构；机构越规范，学校越不敢碰。学校越

是自保式退出，研学市场就越被逐利资本占领。最终，受教育者成了最大的输家。

学校组织研学旅行常常面临三重风险：安全风险——外出各个环节都可能发生意外；廉政风险——但凡涉及收费，总有家长怀疑“中间有猫腻”；专业风险——课程设计、路线规划、安全预案、过程评价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

三重风险叠加，一些学校便不再开展研学。不过，如此行事意味着学校将研学定义为可有可无的选修课程。实际并非如此。《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研学旅行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组织安排的校外教育活动，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进一步将综合实践活动纳入国家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规定

的必修课程。这意味着，组织研学不是学校的额外服务，而是课程实施的题中之义，更是教育公平不能缺失的一部分。

此外，当学校把研学完全推向市场却不做任何课程把关时，机构自然用商业逻辑替代教育逻辑——什么项目好卖就做什么，什么项目利润高就推什么，至于有没有教育价值、是否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破解这个难题，需要多方各进一步。

一是学校要守住课程底线。学校不必包办一切，但至少制定明确的研学课程目标，对合作机构进行课程方案审核而非只看资质，建立透明的费用公示和家委会参与机制。

二是教育管理部门要给学

校撑腰。当学校依法依规组织研学、程序公开透明时，主管部门应为学校和教师提供必要的保护，而不是一有投诉就让学校妥善处理、让教师自我检讨。同时，尽快出台研学旅行的课程标准和操作规范，让学校有章可循、有据可查。

三是家长要区分利益和收益。学校组织的研学，追求的是孩子在真实情境中的成长这一教育收益；市场上的研学产品，追求的是商业利益。用“市场上才花多少钱”来质疑学校的收费，是用商业逻辑否定教育逻辑。家长明确这一点，才能推进学校更好地组织研学。

教育这个怪，装不下一切，但也不能因为怕被质疑就什么都不做。学校退出研学，看似规避了风险，实则把学生推向了更不规范的市场。把学校逼回校园，把学生推给市场——这不是教育的开放，是教育的封闭。

（作者单位均系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实验小学崇和分校）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烟台市教育局）